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53期（民國95年9月），193-226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戰爭與文化：近十年抗戰時期文化史的研究回顧*

馮啟宏**

摘　要

自 1970、80 年以來，文化史和文化研究蔚為新顯學，許多相關課題都成為學者研究的焦點。而「戰爭與文化」專題，正是其中之一。近年來多位學者投入抗戰時期文化史的研究工作，即為此研究風潮下的產物。本文之宗旨，即針對近十年美、中、台三地民國史學者所發表的「中國抗戰時期文化史」論著為對象做回顧，供學界參考。

關鍵詞：抗戰時期、戰爭文化、大眾文化

壹、前　言

1995 年，適逢中國對日抗戰勝利五十週年，當時爲紀念這個近代中國史上的重大事件，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特別邀集了蔣永敬、李恩涵、呂芳上、

---

* 本文係「中國近代史再思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創所五十週年」國際學術研究會發表之論文修改。
收稿日期：2005 年 10 月 18 日，通過刊登日期：2006 年 5 月 4 日。
** 大仁科技大學通識中心副教授

遲景德、張瑞德及陳立文等二十餘位民國史學者就抗戰史研究舉行一個座談會，會中並發表專文回顧抗戰史的研究成果。[1]但一轉眼十年過去了，這十年來抗戰史的研究有何新趨勢？又產生了哪些變化？頗值得再加以回顧。特別是近年來的新興顯學——抗戰時期文化史，更有介紹的必要。

自 1970、80 年以來，文化史和文化研究蔚爲西方世界的新顯學，因此也開發出許多新的研究領域，「戰爭與文化」專題正是其中之一。「戰爭與文化」的關係其實非常微妙，因爲「戰爭」在許多學者眼中，「事實上是不同文化之間的對抗和衝突」。而戰爭一旦爆發，確實會給文化造成嚴重破壞，但是唯有通過戰火的試煉，「人類的文化才得以淨化和昇華，進入一個新的境界」，這正是「戰爭與文化」專題吸引人注意的地方。[2]而近十年來，確實有許多學者投入了抗戰時期文化史的研究工作上。本文之目的，即意圖針對近十年關於中國抗戰時期的文化史作一回顧。不過，限於篇幅及語文能力的限制，再加上「文化」的範疇實在太過廣泛，因此僅能以美、中、台三地民國史學者所發表的「抗戰時期文化史」中、英文論著爲對象，做初步性的研究回顧介紹，疏漏之處還望先賢前輩不吝指正。

貳、中英文著作研究概況

文化(culture)一詞，本來就是一個語意極爲複雜、不易定義的字。Raymond Williams 在他的著作 *Keywords* 解釋稱：「文化是英文中最複雜的兩三個字之一」，所以如此，「主要是因爲它不斷地被使用在許多不同的學術與無法相容的思考系統中」。[3]英國倫敦大學 Goldsmith 學院副院長 Christ Jenks 則進一步

1 見蔣永敬等講述，〈「抗戰史研究座談會」紀錄〉，《近代中國》，期 107、108（1994 年 6、8 月），頁 15-35、213-233。

2 見金重遠，《炮火中的文化》（台北：淑馨出版社，1990），頁 1。

3 Raymond Williams, *Keywords* (London: Fontana, 1976), p. 87. 事實上依據人類學家 Afred Louis Kroeber 與 Luckhohn Clyde 於 1952 年彙集研究，各行家對文化的定義有一百六十多種，後來又有人找出計二百多種界說。見芮逸夫主編，《雲五社會科學大辭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9），冊 10，「人類學」，頁 18-19。

說明「文化」概念有四種涵義：

1. 文化被理解為一種普遍的心態，其中包含著完美的理想。
2. 文化代表著社會中的知識及道德發展的狀態。
3. 文化被視為一社會中藝術與智識作品的集合體。
4. 文化被視為是一個民族的整體生活方式。[4]

由此可知文化概念的涵蓋面非常廣泛，最狹隘的定義幾乎與藝術的定義相同。而最廣義的定義，則幾乎包含了一個民族整體生活方式的總稱。因此可以預見相關論文必定甚多，這表現在近十年中國大陸學者在抗戰時期文化史的研究上，更是明顯。

事實上，在 1990 年代以前，大陸學者對於抗戰史的研究甚爲落後，特別是抗戰文化史部份。據榮天琳主編的《中國現代史論文著作目錄索引(1949-1981)》統計，直至 1980 年代初期，大陸方面與抗戰文化相關的研究論著不僅非常少，而且絕大部份不是介紹性的文字，就是回憶性的文章。[5]不過，拜改革開放政策之賜，大陸學界得到與海外交流的機會，再加上自 1990 年代中期，大陸積極推動高等教育改革計畫，諸如「跨世紀園丁工程」、「二一一工程」，以普遍設置基金並提供獎勵措施的方式提升大陸學者的研究水平後，這種情形有了重大的轉變，相關的學術論文大量出版刊登。據統計，單是期刊論文部份，屬於「抗戰文化史」範疇者即多達數千篇以上，其中不乏具相當水準的文章。所謂的「中國崛起」現象，似乎也出現在抗戰文化史的研究上。

就抗戰時期文化史領域而言，自 1990 年代以來，大陸地區總論抗戰時期文化史就出版了多本論著。[6]其中，馮崇義提出「從五四到抗戰，中國文化是

4 Chris Jenks 原著，俞智敏等譯，《文化》（台北：巨流圖書公司，1998），頁 11。

5 中共自 1949 年之後的抗戰文化思想史研究，見馬勇，〈50 年來的抗戰時期思想文化研究〉，《抗日戰爭研究》，1999 年第 3 期，頁 178-203。

6 包括蕭效欽、鍾興錦編，《抗日戰爭文化史》（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2）；馮崇義，《國魂，在國難中掙扎——抗戰時期的中國文化》（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劉大年、白介夫編，《中國復興樞紐——抗日戰爭的八年》（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文豐義，《血鑄的豐碑：中國抗戰文化》（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王同起，〈抗日戰爭時期的文化思潮〉（天津：南開大學博士論文，2000）等論著。

由『世界化』到『中國化』的路向發展」，「中國化」傾向——即頌揚民族文化傳統及固有道德——成爲抗戰時期文化思想主流之觀點，最受外界注目。再者，教育學術方面，研究重點有二：一是中共根據地陝、甘、冀、察、寧等地區的教育發展概況；另一仍是擺在高校內遷的問題上，如劉麗、李仲明等編的《抗戰烽火中的高校內遷》（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01）即是。不過，近年來注意的焦點逐漸轉移到高校內遷後，卻意外打破西南地區長期封閉，加快西南地區近代化進程的討論上。學校部份，由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共同組成的「西南聯合大學」，長久以來一直都是民國史學界注意的對象。而近十年仍有許多關於西南聯大的論著出版，西南聯大北京校友會即主編了《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史——1937 至 1946 年的北大、清華、南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7]除了西南聯大，其他高等院校如中央大學、教會學校等，這幾年都有論著作相關討論，甚至把研究觸角延伸到中等學校。另外在文學藝術部份，由於抗戰時期左翼文化人的聲勢非常大，所以這幾年大陸學者的研究非常多。舉文學作家爲例，不僅著名的郭沫若、茅盾、巴金有相關研究評論出現，許多抗戰時期竄起的年輕小說家，如寫《飢餓的郭素娥》的路翎、《龍煙村紀事》的劉白羽、《大地的城》的豐村、《風砂之戀》的碧野、《災魂》的田濤、《高原短曲》的周而復，都有學者作專題性的研究。[8]至於藝術方面，無論是美術、木刻活動抑或冼星海的歌詠音樂、曹禺與陽翰笙等人的戲劇，都是學者注目的焦點，有許多相關論著出版。包括黃宗賢，《大憂患時代的抉擇：抗戰時期大後方美術研究》（重慶：重慶出版社，2000）、喬玲梅，《抗戰時期的中國戲劇》（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01）、李道新，〈抗

7 關於西南聯大，美籍民國史學者 John Israel（易社強）在 1998 年也出版了 *Lianda: A Chinese University in War and Revolutio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一書。

8 一個最明顯的例子，西南師範大學畢業的袁桂娥就以豐村爲研究中心，發表過許多篇論著，其中最重要著作是〈抗戰語境下的豐村小說研究〉（重慶：西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3）。此外，還有數篇相關文章，如〈抗戰時期豐村小說創作的獨特思考〉（《平頂山師專學報》，2000 年第 1 期，頁 22-23）及〈爲戰時的北方農民塑像——豐村小說人物談之一〉（《平頂山師專學報》，2003 年第 3 期，頁 41-42）等篇。

戰時期中國電影史論〉（北京：中國藝術研究院博士論文，1996）及王家康，〈抗戰時期思想文化背景中的歷史劇寫作〉（北京：北京大學博士論文，2003）等都是。[9]另外，南京大學歷史博士梁家貴以山東地區的民間教門及幫會為中心，出版了《抗日戰爭時期山東秘密社會研究》（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5）一書，提供了抗戰時期中國底層階級社會的另一面相。

大陸近十年來的抗戰文化史研究，還有一個重要趨勢，即地區抗戰文化在該地學者的投入之下愈發地勃興。其研究重點或置於整個城市及區域上，或是專注在特定的歷史事件上。前者除了「桂林文化城」仍持續有專論出版，薛新力、黎維新、王嘉良等人分別針對重慶、長沙及東南地區的抗戰文化史出版過專著。[10]近年來備受國際矚目的上海，齊衛平、朱敏彥、何繼良三人亦著有《抗戰時期的上海文化》一書。至於後者，南京學者對於「南京大屠殺」的研究可作為代表。其中，南京師範大學「南京大屠殺研究中心」實際負責人張連紅，不僅整理出版了《魏特琳日記》（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等相關的史料書籍，且一別過去以民族仇恨為出發點的作法，改從文化、社會心理、人道的角度探討南京大屠殺，其論著：〈南京大屠殺對南京市民社會心理的影響〉（《江蘇社會科學》，2000 年第 6 期，頁 112-116）、〈南京大屠殺之前南京市民的社會心理〉（《抗日戰爭研究》，2002 年第 4 期，頁 83-104）、〈南

9 關於李道新，他在 2002 年還出版了《中國電影批評史：1897-2000》（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02）一書。而該書第一部份「中國電影的社會學批評時期」，把抗戰時期(1937-1945)定名為「救亡批評時期」。事實上在電影方面，除了李道新以電影批評角度探討抗戰時期中國電影之外，中國社科院近史所研究員汪朝光這幾年也撰寫了許多關於民國時期電影方面的論著。特別是在戰時中國政府的電影檢查制度方面，汪氏探討尤力。包括：〈抗戰時期淪陷區的電影檢查〉（《抗日戰爭研究》，2002 年第 1 期，頁 26-51）；〈三十年代初期的國民黨電影檢查制度〉，（《電影藝術》，1997 年第 3 期，頁 60-66）；〈中國影評中的美國電影〉〔收入陶文釗、梁碧瑩主編，《美國與近現代中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頁 397-409〕；〈民國年間美國電影在華市場研究〉（《電影藝術》，1998 年第 1 期，頁 57-65）；〈戰後上海美國電影市場研究〉（《近代史研究》，2001 年第 1 期，頁 119-140）。

10 這方面的論著分別有蘇文光，《抗戰時期重慶的文化》（重慶：重慶出版社，1995）；薛新力主編，《重慶文化史》（重慶：重慶出版社，2001）；黎維新，《長沙文化城：抗戰初期長沙抗日救亡文化運動實錄》（長沙：湖南出版社，1995）；金延鋒、黄旦主编，《浙江抗戰文化》（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5）及王嘉良、葉志良、毛策，《中國東南抗戰文化史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

京大屠殺與南京市民的創傷記憶〉(《江海學刊》,2003 年第 1 期,頁 146-151)等,均有參考價值。

無論是作品數量抑或研究主題的多元化情形,近十年來大陸地區抗戰時期文化史研究的發展堪稱神速。進步幅度雖大,但大陸學者在書寫抗戰時期文化史時仍太過偏重中共部份,對國民黨的文化政策少有探討。像他們在介紹某地區文化活動或報紙期刊時,也都偏重與中共相關者,縱使是國統區政治中心的重慶也不例外。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抗戰時期中國文人的研究上。被鎖定的對象大部份是所謂「進步」的知識分子,即立場「傾共」者。[11]此一情形雖多少反映出中共在肯定國民黨「正面戰場」之餘,對戰時國民黨的文化政策仍不假辭色的事實,但從另一角度來看,未來這部份有很大的書寫空間。

相對於大陸地區抗戰文化史研究的蓬勃發展,過去被認爲在抗戰史研究工作上領先中國大陸甚多的台灣,則明顯出現消退現象。[12]大部份作品都是學術研究會上發表的論文,專書及學位論文並不多見。[13]追究其原因,顯然跟台灣解嚴後,國家定位由「中華民國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轉向「中華民國在(是)

11 我們舉大陸張紅新近出版專書:《抗戰中內遷西南的知識分子》(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爲例,全書裡所指「在西南地區積極發展抗戰文化運動」,「使西南地區獲得前所未有的發展契機,各項建設事業得較大發展」(頁 232)的知識分子,正是勇於與國民黨反動文化政策相抗衡的「進步知識分子」。

12 李雲漢在 1988 年中央研究院成立六十週年慶祝專刊《六十年來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即指稱,在抗戰史的研究上,台灣方面的成果顯然比大陸「進步多多」(上冊,頁 436)。

13 舉博、碩士論文爲例,近十年來與抗戰文化史相關的僅有寥寥數篇而已,僅有林君儀,〈抗戰後期的學者散文──王力、梁實秋、錢鍾書三家研究〉(新竹:國立清華大學碩士論文,1995);彭永貞,〈冼星海與抗戰時期的歌詠運動〉(台北:台灣師範大學碩士論文,1996);林志宏,〈戰時中國學界的「文化保守」思潮(1941-1948)──以《思想與時代》爲中心〉(中壢:國立中央大學碩士論文,1997);劉惠璇,〈抗戰時期大後方大學訓育問題之研究〉(台北:台灣師範大學博士論文,1997);鄭炯兒,〈從掃蕩到和平──掃蕩報之研究(1931-1950)〉(台北:台灣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0);溫楨文,〈抗戰時期商務印書館之研究〉(新竹:國立清華大學碩士論文,2002);黃蘭燕,〈豐子愷文人抒情漫畫研究──以 1937 年畫作之研究〉(中壢:國立中央大學碩士論文,2002);蔡岳璋,〈陝甘寧邊區的農村教育(1937-1947)〉(台北:國立政治大學碩士論文,2003);陳逢申,〈戰爭與文宣:以中國抗日戰爭時期的話劇、音樂及漫畫爲例 1937-1945)〉(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博士論文,2004)等篇。而專書部份,學術性的著作也只有胡國台,《浴火重生:抗戰時期的高等教育》(台北:稻香出版社,2004)一本而已。

台灣」，執政當局不再熱中於抗戰史主導論述權的爭奪有很大關係。不過，台灣近年來有關抗戰文化史的專書雖不多，但仍有學者開拓出新的課題。像東海大學社會系教授黃金麟引用「身體政治」(body politics)此一女性主義論述裡的核心概念，雖以戰前中國為研究年限，但他撰寫的〈醜怪的裝扮：新生活運動的政略分析〉〔刊登於《台灣社會研究季刊》，期 30(2002)，頁 163-203〕一文，仍可被劃入抗戰文化史的範疇裡。[14]再者，近來學界常討論的「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課題，也被引用到抗戰時期的文化史研究裡。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張瑞德就以「集體記憶」領域裡的「紀念研究」(commemoration studies)一項在 1997 年寫了〈紀念與政治——台海兩岸抗戰五十週年紀念活動的比較〉（發表於「紀念七七抗戰六十週年學術研討會」）。[15]另外，該所副研究員羅久蓉分別從審奸資料、歷史情境、政治與性別的角度重新審視了「漢奸」問題，也擴大此一主題的研究視角。[16]

14 黃金麟在這方面主要的論著是《歷史、身體、國家：近代中國的身體研究》（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1），以及《政體與身體：蘇維埃的革命與身體，1928-1937》（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5）。

15 事實上，張瑞德還注意到庶民階層在抗戰時期的心態及感受問題，分別發表了〈抗戰時期大後方工商業者的心態與行動〉〔《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期 27（1999 年 6 月），頁 121-146〕及〈戰爭與工人文化——抗戰時期大後方工人的認同問題〉〔收入黃克武主編，《中央研究院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軍事組織與戰爭》（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頁 243-273〕這兩篇文章。

16 對於漢奸的問題，近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羅久蓉發表了不少文章。包括：〈抗戰勝利後中共懲審漢奸初探〉〔《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23（下）（1994 年 6 月），頁 267-292〕；〈歷史情境與抗戰時期「漢奸」的形成：以一九四一年鄭州維持會為主要案例的探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24（1995 年 6 月），頁 815-842〕；〈張愛玲與她成名的年代(1943-1945)〉〔收入楊澤主編，《閱讀張愛玲研討會論文集》（台北：麥田出版公司，1999），頁 117-134〕、〈軍統特工組織與戰後漢奸審判〉〔收入一九四九年中國的關鍵年代學術討論會編輯委員會編，《一九四九年：中國的關鍵年代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台北：國史館，2000），頁 515-546〕；〈戰爭與婦女：從李青萍漢奸案看抗戰前後的兩性關係〉〔收入呂芳上主編，《無聲之聲：近代中國與國家(1600-1950)》（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Survival as Justification for Collaboration, 1937-1945,” in David P. Barrett and Larry N. Shyu, eds., *Chinese Collaboration with Japan, 1932-1945: The Limits of Accommod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116-132；“Trials of Taiwanese as Hanjians/War Criminals and Post-war Search for Taiwan Identity,” in Kai-sing Chow, Kevin M. Doak, and Poshek Fu, eds., *Imagining National Identity in Modern East Asia*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1), pp. 279-316 等多篇論文，對漢奸及戰後漢奸審判問題有深入討論。

至於美國，近十年來對於抗戰時期中國文化史的研究也產生一些結構性的變化。首先，在研究者方面，因受到近年來大陸赴美留學人數大幅增加的影響，故研究的人員大都具有華裔背景。例如，以抗戰時期隨國民政府撤退到重慶的文學作家為中心，探討戰時中國知識分子的民族意識及他們與執政者關係的 Kan Liang（即梁侃，見"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the war: Chongqing, 1937-1945," Yale University Ph. D. dissertation, 1995）、從 1990 年代初期開始即陸續發表文章，以研究淪陷時期北京地區教育概況著稱的 Sophia Lee（其博士論文即為 "Education in wartime Beijing: 1937-1945," Michigan University Ph. D. dissertation, 1997）、探討「七月詩派」的 Yunzhong Shu [*Buglers on the Home Front: The Wartime Practice of the Qiyue School*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0)]、從女性主義及物質主義角度出發，書寫淪陷時期上海女性作家生活及流行文化的 Nicole Huang [*Women, War, Domesticity: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Popular Culture of the 1940s* (Leiden, Boston: Brill, 2005)]、以抗戰時期新佛教運動領袖太虛為中心，析論抗日戰爭爆發後在民族主義高漲情形下，中國佛教界自處之道的 Yu Xue [*Buddhism, War, and Nationalism: Chinese Monks in the Struggl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1931-1945* (New York: Routledge, 2005)]，以及撰寫 *Passivity, Resistance, and Collaboration: Intellectual Choices in Occupied Shanghai, 1937-194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一書，近年來轉向研究戰時上海電影事業的傅葆石(Poshek Fu)等人，均為華裔人士。再者，研究論點方面，作為西方文化思想薈萃之地的美國學界，積極開發新課題自然不在話下。一個最的明顯例子，就是前哈佛大學教授、現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的李歐梵(Leo Ou-Fan Lee)提出之中國文學「現代性」(modernity)論述。另外，香港科技大學教授洪長泰(Chang-Tai Hung)對戰時中國通俗文化的研究，以及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文學系教授張英進(Yin-gjin Zhang)對戰時中國電影的析論，都甚具影響力。以近年來美國興起的中國熱風潮來看，相信還會有更多更好的論著出現。

近十年來，美、中、台三地民國史學界關於抗戰文化史的研究，中國大陸無論是數量抑或品質，顯然進步幅度最大。而過去積極引入社會科學理論及方法，而對兩岸民國史學界有不小啓示作用的美國學界，近年來仍維持一貫風格，不僅開創出許多與抗戰時期文化史相關的新議題，更讓整個的研究視野開拓甚多。至於台灣，雖然近年來因本土意識抬頭，導致民國史研究不若以往興盛，但相對地，隨著意識形態的鬆綁，也讓台灣的民國史研究呈現出多元化的趨勢，這表現在抗戰史的研究上更是明顯。因此台灣學界對於抗戰文化史的研究仍有頗大的發展空間，是無庸置疑的。

參、研究重要論述與特色

根據美、中、台三地學者的研究論述，近十年抗戰時期文化史研究有下列四項特色：

第一，「翻案」風潮的興起

被翻案的對象，不僅有長期被誤解的對象，而且還涵蓋過去被視爲學術禁忌的議題。在這方面，最著稱的莫過於「戰國策派」及「七月詩派」。早自1940 年代初期開始，就被中共定位爲法西斯主義餘孽的「戰國策派」，近十年來的相關論著幾乎都在爲這個學派進行翻案。[17]認爲將「戰國策派」硬性地置於國共鬥爭的框架中，扣上「反動派」的大帽子，顯然有失公允。因爲「戰國策派」所代表的不僅是戰時中國知識分子的一種思想潮流，理性的成分大，

17 關於「戰國策派」，近十年來的重要論著有丁曉萍，〈『戰國策派』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反思〉（北京：北京大學碩士論文，1994）；馮啓宏，《戰國策派之研究》（高雄：復文書局，2000）；江沛，《戰國策派思潮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魏小奮，〈戰國策派：抗戰語境裡的文化反思〉（北京：北京大學博士論文，2002）。對於「戰國策派」的成員，其實過去有各種不同說法。有指「戰國策派」是陳銓、吳宓、沈從文、雷海宗、林同濟等人，也有把陳銓、何永佶、雷海宗、林同濟及賀麟指爲「戰國策派」。對於上述爭議，筆者認爲，判斷何人是「戰國策派」，除了要觀察他們的論點是否一致，還應注意他們在相關刊物上的文章數量，畢竟「戰國策派」是因《戰國策》雜誌而得名。見馮啓宏，《戰國策派之研究》，頁 3。

而且學術味道非常重。同樣的情形，也出現在「七月詩派」身上。因胡風於1938年在武漢主編的《七月》雜誌、《七月詩叢》而得名的「七月詩派」（又稱「七月派」），在過去受到胡風一案的牽連，如同禁地般少有人敢接近。但近幾年隨著政治局勢的轉變，亦由谷底翻身，出現許多重要著作。單就專書方面，除了前述 Yunzhong Shu 在美國出版的 *Buglers on the Home Front: The Wartime Practice of the Qiyue School*〔(New York: University State of New York Press, 2000)，中譯本：《前線的司號兵：抗戰時期「七月學派」的實踐》〕之外，就有數本之多。[18]

另外，McIsaac, Mary Lee 的博士論文〈中國民族主義的侷限：以抗戰時期的重慶工人爲中心，1937-1945〉("The Limits of Chinese Nationalism: Workers in Wartime Chongqing, 1937-1945," Yale University Ph. D. dissertation, 1994)及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張瑞德的〈戰爭與工人文化——抗戰時期大後方工人的認同問題〉（收入《中央研究院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軍事組織與戰爭》）指稱，雖說抗戰時期工人確實存有反日情緒，但是具有近代意義的民族主義(nationalism)則似乎尚不普遍。此一論點與傳統指抗戰時期國難當前爲團結抗日，「民族主義超過階級矛盾」的說法明顯不同，也算是另一種形式的翻案。[19]不過，近十年翻轉最厲害的，莫過於抗戰時期淪陷區的文化人研究。

---

18 在這方面的專書另有李怡，《七月派作家評傳》（重慶：重慶出版社，2000）；葉德浴，《七月派：新文學的驕傲》（北京：中國文聯，2001）；周燕芬，《執守反拔超越：七月派史論》（北京：中華書局，2003）。此外，另有學術論文數十篇，如楊洪承，〈七月派文學群體的文化結構探源——現代中國文學社群的個案研究之一〉（《社會科學輯刊》，1998年第6期，頁44-50）；周燕芬，〈從流派的構成看七月派的存在形式與特徵〉（《華中師範大學學報》，2002年第2期，頁40-44）；黃曼君，〈現代・反思・延異——胡風與七月派現代性重讀〉（《華中師範大學學報》，2003年第5期，頁86-95）；周燕芬，〈文學流派與經典營構——以「七月派」爲例〉（《人文雜誌》，2004年第4期，頁125-128）等篇即是。

19 張瑞德在另一篇文章〈抗戰時期大後方工商業者的心態與行動〉〔見《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期27（1999年6月），頁121-146〕也提出了類似的論點。他指出，戰時大後方的工商業者並非如過去所說，因考慮到國難當前，故對任何問題都能體諒當局而「逆來順受」。事實上，大後方的工商業者對於國民政府所採取的經濟統制措施，感到相當苦惱而亟思反制。其採取的方法，從溫和的集會請願到非法的欠繳稅款都有，甚至與官府發生衝突。可見過去所建構的全民「共赴國難」的說法，根本就是神話。

過去對於未跟隨國民政府撤退到大後方，而選擇留在淪陷區的文人，評價向來很低，甚至目眥其為「漢奸」。但是這種看法，近十年來開始受到挑戰。其中翻案最力者，是美籍華裔學者傅葆石。對於淪陷區的文人，傅葆石大體上抱著同情的態度，認為他們所面臨的困境並不遜於內遷的知識分子，有時為了生存甚至需要向現實低頭。傅氏最早在他大作《消極、抗日與通敵：淪陷時期上海的思想抉擇》[*Passivity, Resistance, and Collaboration: Intellectual Choices in Occupied Shanghai, 1937-194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一書中，即把淪陷時期上海的作家和文人對日本佔領軍的態度區分為三類：隱匿逃避、勇敢抵抗與妥協合作，並分別以王統照、李健吾和《古今》雜誌的主筆群做為代表。傅葆石聲稱，不管是為了謀生，或者是貪圖一時虛榮，淪陷區文人曖昧的政治態度，雖不能稱之為「愛國」，但也不能因此判定他們是「賣國」，而應視之為中間的「灰色地帶」。事實上，這種曖昧態度並非僅限於作家和文人，淪陷區裡大部份民眾朝夕面對敵人佔領的威脅與現實，都無法完全避免。易言之，傅葆石認為不應該用春秋大義、民族氣節來扣這些文人帽子。畢竟，這是他們在現實考量下所作的抉擇，不能苛責。

近年來把研究重心轉移到淪陷時期上海電影事業的傅葆石，其實也是從上述論點出發。[20]同樣強調把淪陷區電影通通目眥為漢奸電影，並不客觀。他並

20 近年來傅葆石發表的關於上海淪陷時期電影業的文章有〈娛樂至上：日本佔領時期上海電影的政治曖昧性，1941-1945〉("Struggle to Entertain: The Ideological Ambivalence of the Wartime Shanghai Film Industry, 1942-1945," paper delivered at the 108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January 8, 1994)；〈影射歷史：戰時上海的大眾電影文化〉("Framing History: Popular Film Culture in Wartime Shanghai,"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ssociation of Asian Studies Annual Meeting. Hilton, Washington, April 6-9, 1995)；〈曖昧的娛樂：日本佔領下的上海電影，1941-1945〉("The Ambiguity of Entertainment: Chinese Cinema in Japanese Occupied Shanghai, 1941-1945," *Cinema Journal* 37:1(1997), pp. 66-84)；"Telling a Woman's Story: Eileen Chang(張愛玲)and the Invention of Woman's Film in Postwar China," in Law Kar, ed., *Transcending the Times: King Hu and Eileen Chang* (Hong Kong: Urban Council, 1998)；〈游移不定：半佔領時期的上海電影圈〉["Projecting Ambivalence: Chinese Cinema in Semi-Occupied Shanghai, 1937-1941," in W. Yeh, ed., *Wartime Shanghai* (New York: Routledge, 1998)]，以及〈淪陷時期上海電影的娛樂政治〉〔收入紀念七七抗戰六十週年學術研討會籌備委員會編，《紀念七七抗戰六十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國史館，1998）〕。另外，傅葆石最近的新著也是電影為主，其書名為 *Between Shanghai and Hong Kong: The Politics of*

舉「首先公開投敵」的新華電影公司老闆、後來更籌組「僞中聯」、「僞華影」的上海電影大亨張善琨爲例，認爲不能完全以忠奸的標準來衡量其行徑。蓋在傅葆石眼中，張氏之決定留在淪陷區，是他不甘心奮鬥多年、如日中天的事業就此結束，也不放心一大家子的性命財產。雖說他爲了取得日汪政權合作，難免作出一些妥協，在政治上的立場曖昧，但不管是「僞中聯」抑或「僞華影」所拍出的片子，依然是以娛樂性爲取向，而非日汪政權所期待的政治宣傳片。單從這點來看，把張善琨說成漢奸，是有點過份。

不過，並不是每個翻案的結果都讓人口服心服。特別是淪陷區文化人的翻案，還是讓一些保守人士無法接受，進而引發爭議，從 2000 年開始，在中國大陸一場長達三年的論戰，就和這個有關。而爭論的對象，正是張愛玲。

張愛玲，晚清重臣李鴻章的外孫女，1921 年生於上海，1995 年病逝於美國洛杉磯。生前重要文學作品有《秧歌》、《傾城之戀》、《海上花開》、《海上花落》、《半生緣》、《赤地戀》等。雖說文壇對張愛玲的評價不一，但她在華人世界引發的熱潮卻是近代文學作家中少見，堪稱爲華人文學界的新顯學。此從張愛玲過世後，不僅曾爲她盛大舉辦多場國際學術研討會，而且海內外還出版了數十本關於張愛玲傳記及評傳的書籍，可窺探出一二。[21]在張愛玲一生的寫作生涯中，大概可劃分爲上海及香港兩大時期。其中，張愛玲上海寫作生涯正值上海淪陷時期，加上她當時某些作品被指涉爲媚日言論，故抗戰時期的張愛玲一直被爭議，甚至被大陸部份人士公開點名是「文化漢奸」。不過，在近年的翻案風潮下，北京市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張泉，亦起身爲張

Chinese Cinemas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21 單在台灣方面，近十年來出版的張愛玲評傳的書籍就有盧正珩，《張愛玲小說的時代感》（台北：麥田出版社，1994）；張谷，《華麗與蒼涼：張愛玲紀念文集》（台北：皇冠出版社，1996）；水晶，《張愛玲未完》（台北：大地出版社，1996）；水晶，《張愛玲的小說藝術》（台北：大地出版社，2000）；林幸謙，《歷史、女性與性別政治：重讀張愛玲》（台北：麥田出版社，2000）；蘇偉貞，《孤島張愛玲：追蹤張愛玲香港時期(1952-1955)小說》（台北：三民書局，2002）；魏可風，《張愛玲的廣告世界》（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02）；高全之，《張愛玲學：批評・考證・鉤沉》（台北：一方出版社，2003）。至於「閱讀張愛玲：張愛玲國際學術研討會」的論文內容，請參閱楊澤主編，《閱讀張愛玲——張愛玲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台北：麥田出版社，1999）一書。

愛玲翻案。

對於長期鑽研淪陷區文學的張泉來說，他早就對全盤否定淪陷區文學的講法感到不耐煩，而且對張愛玲是「文化漢奸」的論述更不認同。故 1997 年他即藉著回應他人批評其著書：《淪陷時期北京文學八年》的機會開始著手反擊，爾後他還陸續發表文章駁正。[22]到了 2002 年，張泉發表〈淪陷區文學研究應當堅持歷史的原則——談淪陷區文學評價中的史實準確與政治正確問題〉(《抗日戰爭研究》，2002 年第 1 期，頁 1-23）一文，正式點燃戰火。張泉以爲無論是國際慣例，或從文學主體中所保持的民族精神來看，淪陷區文學絕對「有資格躋於中國抗戰文學和世界反法西斯文學，融入中國新文學。」至於說張愛玲是文化漢奸，完全是莫須有的政治身分指控，因爲他們不但片面地援引了傅雷錯誤的觀點，而且主要的證據，居然僅是從張愛玲作品中挑選出的隻言片語。因此，張泉聲稱全盤否定淪陷區文學價值的人，根本仍停留在戰時大後方一種普遍的社會思潮——留在淪陷區的就是「僞」——之階段，在迂腐的「春秋大義」、「民族大節」觀念下，錯以爲淪陷區文學不是中華民族文學，而是漢奸文學；沒有堅持愛國立場淪陷區文人，便是漢奸作家和附敵附逆作家。[23]

張泉的文章刊出後，最早指責張愛玲是文化漢奸，全盤否定淪陷區文學的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陳遼跳了出來，撰文〈也談淪陷區文學研究中「歷史的原則」——與張泉先生商榷〉（見《抗日戰爭研究》，2003 年第 1 期，頁 157-172）反擊。[24]對於張泉替淪陷區文學的辯駁，陳遼完全不贊成。因爲在他

---

22 張泉的反駁文章分見〈中國淪陷區文學的研究中的政治立場問題——對《淪陷時期北京文學八年》一書的政治評價的回應〉（《北京社會科學》，1997 年第 4 期，頁 98-105）；〈史實是評說淪陷區文學的唯一前提——對「淪陷區文學評價問題」的回應〉（《文藝報》，2000 年 3 月 28 日）；〈二論史實是評說淪陷區文學的唯一前提——對「淪陷區文學認識誤區」的回應〉（《北京社會科學》，2001 年第 2 期，頁 132-139）等文。

23 見張泉，〈淪陷區文學研究應當堅持歷史的原則——談淪陷區文學評價中的史實準確與政治正確問題〉，《抗日戰爭研究》，2002 年第 1 期，頁 1-23。

24 陳遼對於張愛玲的看法，見陳遼，〈「張愛玲熱」要降溫〉，《文藝報》，1996 年 5 月 3 日；〈關於淪陷區文學評價中的幾個問題〉，《文藝報》，2000 年 1 月 11 日；〈淪陷區文學評價中的三大分歧——對「關於淪陷區作家的評價問題——張愛玲個案分析」的回應〉，《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01 年第 3 期，頁 119-125。

眼中，淪陷區文學是由日偽政權出錢出力，有目的地搞起來的文學。換言之，所謂的淪陷區文學根本就是日本佔領者用來思想探制、麻痺淪陷區民眾的御用工具。至於像張愛玲之類的附逆文人，他們的文學作品雖表面上不談政治，實則粉飾現實，消磨淪陷區民眾的鬥志，故附逆文人所創作的文學，是有利於敵偽。正因為張愛玲之流的文人作品具包藏禍心之本質，陳遼更堅稱，評價淪陷區文學及作家時，「不能不講政治，不能不講民族大義」，唯有這樣才對得起當年在解放區及國統區撐起抗戰文學的老作家們。

從上述被翻案的內容及對象來看，這十年來抗戰文化史研究會興起翻案風潮的背景大致有二：第一，政治意識形態的轉向，中國大陸學者近年來為「戰國策派」及「七月詩派」翻案多少與此有關。蓋因「戰國策派」的雷海宗及「七月詩派」的胡風，先後在中共的政治鬥爭中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但隨著政治意識形態的轉向，這些當年的「反動派」不僅被摘了「帽子」，而且陸續恢復名譽，學術界的翻案正是對這些「冤案」主角人物的歷史地位做了平反工作。第二，則是受到西方「後學」對身分與國族認同論述的影響。是以中國工人階級在國難當前的時刻，國家認同有無壓過其原有的階級認同，地域觀念是否受到國家觀念的挑戰等諸多問題，才會重新被張瑞德等人檢視。至於淪陷區文人，他們所面臨的「認同」問題更是棘手，因為他們除了有一般淪陷區人民無法避免的政治認同危機，還有文化的認同困境。到底應該堅持原有的文化傳統，抵制殖民者強勢文化的侵略，還是為了生存而違心屈就於殖民文化的體制內，成為淪陷區文人的兩難抉擇。而張泉、傅葆石等人就是站在「深入把握人性和人的生存環境的基礎上，設身處地分析淪陷區『人』的生存境況」，為淪陷區文人翻案。[25]只是「漢奸」一辭，原本所描述的就不是一個「客觀事實」，甚至是一種強烈民族主義情緒的字眼。要替背負「漢奸」之名的人洗脫罪名，難免會引發近來民族主義情緒正熾的中國部份學者之反彈，陳遼與張泉之論爭實導因於此。

25　見張泉，《抗戰時期的華北文學》（貴陽：貴州教育出版社，2005），頁 17。

第二，西方後學論述的援引

被援引的論述，從文本的概念、女性主義論點、後殖民論述到傅柯的知識考古學說，都陸續被引用到抗戰時期史化史的研究上，甚至有形成潮流的趨勢。而帶領風氣之先的，當然是來自美國方面的學者，如最早提出中國文學「現代性」論述的李歐梵即是。

「現代性」概念，其實是 1980 年代西方學界時興的課題，其思想源流可上溯自 Matei Calinescu 的經典名作《現代性的五種面貌：現代主義、先鋒派、頹廢、媚俗藝術、後現代主義》[*Five Faces of Modernity: Modernism, Avant-garde, Decadence, Kitsch, Postmodernis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7)]，而被李歐梵援引到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上。他在 1980 年代初期爲費正清編的《劍橋中國近代史》寫有關中國文學章節時，所用的標題正是「文學潮流：現代性探索(1885-1927)」。[26]該書出版後，中國文學的現代性論述即引起華人文學界的一股風潮。[27]雖說最初研究的範圍大都侷限在戰前的 1930 年代，但近年來已逐步推移到抗戰時期的文學作品上。[28]如魏朝勇，〈疏離與敞開——由兩個小說〈寒夜〉、〈傾城之戀〉文本談抗戰時期文學現代性的另向維度〉〔見《純文學》，復刊期 6（1998 年 10 月），頁 20-28〕、溫奉橋，〈「現代性」規範

---

26 李歐梵之所以援引現代性的概念研究中國現代文學，是因爲李氏眼中的中國現代文學，表現出十九世紀歐洲的兩種「現代潮流」——一是繼承自啓蒙主義的「現代性」概念，充滿對人類歷史進展和科技文明的信心，另一則是受到浪漫主義影響，對上述信念的質疑和反叛——相互間衝突與矛盾的情形出現。見李歐梵口述，《徘徊在現代和後現代之間》（台北：正中書局，1996），頁 12。

27 關於這點，近十年來探討中國文學現代性的中文專書就有王德威，《如何現代，怎樣文學？19-20 世紀中文小說新論》（台北：麥田出版社，1998）；宋劍華主編，《現代性與中國文學》（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9）；溫奉橋，《現代性與 20 世紀中國文學》（北京：中國海洋大學，2004 年）；陳曉明主編，《現代性與中國當代文學轉型》（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3）；俞兆平，《現代性與五四文學思潮》（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2）；余虹，《革命·審美·解構——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理論的現代性與後現代性》（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等多本。

28 過去研究焦點會置於 1930 年代，應受到李歐梵的影響。據李歐梵的說法，他個人「自己真正的興趣也可以說是二十世紀的前半期，就是從 1900 年到 1930 年代。現在因爲大家研究的興趣，我再推到 1940 年代，而對於 1940 年代以後的東西我有點猶豫不決。」見李歐梵口述，《徘徊在現代和後現代之間》，頁 112。

的調整──張恨水「抗戰小說」新論〉(《中國海洋大學學報》,2003 年第 6 期,頁 46-50)、石世明等,〈民族解放意識與文學現代化的雙向突進──對抗戰時期的重慶文學現象的思考〉(《重慶工商大學學報》,2004 年第 4 期,頁 140-143)等篇,即是這方面的研究成果。作品數量雖然還不多,但是以研究熱潮一直未見消退的情況來看,未來有成爲主流的趨勢。

李歐梵除了援引現代性論述研究中國現代文學蔚爲一時典範,他在 1999 年出版的 *Shanghai Modern: The Flowering of a New Urban Culture in China, 1930-1945*〔(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中譯本:《上海摩登:一種新都市文化在中國 1930-1945》〕意圖透過 1930、40 年代上海的電影院、流行雜誌及城市指南來審視電影文化與上海城市現代化的關係時,還進一步地將西方「頹廢」美學的論述引用了進來。對李歐梵來說,1930、40 年代的上海簡直是一個充斥著頹廢及浮華的城市,此由他所重繪的 1930、40 年代上海城市指南,特別把電影院、戲院、咖啡館、舞廳、百貨公司等休閒──李氏指爲是「閒逛」──場所標誌出來,即可證明。尤其是上海的電影院,更是李歐梵眼中頹廢場域的代表。李氏強調,電影雖是外國玩藝,但傳入中國後,因電影不僅是娛樂品,而且又有藝術價值,故很快地受到知識階層的歡迎,很多上海文人名流仕女,都把看電影當成重要消遣。故在 1930、40 年代的上海,去電影院成爲一種對城市空間的體驗,有如令人銷魂的電影「魔宮」(“movie palace”),甚至是一個可以讓男人和女人在黑暗中遭逢摩登味十足的社交空間。因此,電影院、戲院,跟咖啡館、舞廳、百貨公司一樣,不僅是 1930、40 年代上海人民休閒和消費場所的象徵,亦是一個頹廢、市民閒蕩的地方。[29] 李歐梵的論點雖引發了不少批判,或指它是「老上海文化的拜物教」(夏鑄九語),甚至有人批評該書「只是懷十里洋場的舊,對底層生活的艱苦卻視而不見」〔見朱崇科,〈評李歐梵《上海摩登:一種都市文化在中國一九三〇──

29 見 Leo Ou-Fan, Lee, *Shanghai Modern: The Flowering of a New Urban Culture in China, 1930-1945*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一書。

一九四五》〉，《當代》，期 184（2002 年 12 月），頁 128-141〕。但是誠如王德威在該書序中所言，李歐梵的寫法「預示著新世紀的一種新文化評論風格」，具有相當深遠的影響。

李歐梵《上海摩登》一書第二部份，其標題為「現代文學的想像：作家與文本」。將作家、作品乃至於整個都市都做為一個個開放式的文本，意圖通過作家與文本的關係，勾勒出一個城市現代性多種面貌之做法，在「後學」當道的今天甚為普遍。事實上不單文本而已，許多與後學相關的理論都成為文化史研究的重要依據。另一著名美籍華裔學者張英進(Ying-jin Zhang)，即援引傅柯(Michel Foucault)*L'Archéologié du Savoir*〔中譯本：謝強、馬月譯，《知識考古學》（北京：三聯書店，1998），英譯本：*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and the Discourse on Language* (New York: Harper Torchbooks, 1972), trans. A. M. Sheridan Smith〕的概念，針對抗戰時期文化史相關的主題作探討。而他關注的焦點，剛好也是電影與抗戰前後的上海城市文化。

對於抗戰前後的上海城市文化，張英進早在 1996 年的著作《中國現代文學於電影中的城市：空間、時間與性別的結構》[*The City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 Film: Configurations of Space, Time, and Gender*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裡，即從文本的角度觀察到近代上海會讓人產生一種腐化墮落、追逐金錢和時髦的印象，跟文學作品及電影所傳達的城市風格有莫大關係。特別是電影，更把這種印象具體化地呈現出來。故張英進在研究電影視覺文化之餘，還針對抗戰前後的上海電影與城市文化的形成，收錄了一群年輕學者的相關論著，主編了《民國時期的上海電影與城市文化，1922-1943》[*Cinema and Urban Culture in Shanghai, 1922-1943*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一書。[30]在該書導言部份，張英進即聲稱他研

30 對於中國電影，張英進撰寫的期刊論文就有〈中國電影中的民族性與國家話語〉〔《二十一世紀雙月刊》，總期 44（1997 年 12 月），頁 74-84〕；〈民國時期的上海電影與文化〉〔《二十一世紀雙月刊》，總期 60（2000 年 8 月），頁 98-106〕；〈娼妓文化、都市想像與中國電影〉〔《當代》，期 137（1999 年 1 月），頁 30-43〕；〈美國電影中華人形象的演變〉〔《二十一世紀》，2004 年 6 月號；〈審視中國：評五本中國電影研究的英文書籍〉，《二十一世紀

究這個問題，主要是引用傅柯「知識考古學」的概念。而他會這麼做有三個原因：第一，是這個領域的研究並不深入，大量文獻研究仍有待學者去發掘；其次，早期的原創電影大都已流失，故探究早期中國電影的工作本來就需要像考古學一樣挖掘人文遺跡。只是它挖掘的對象，是電影廣告海報、影迷雜誌、電影說明書、影評、傳記等文獻資料，以尋求這些文化現象在早期歷史文本中的構造和功能；第三，由於考古出來的文獻需要進一步解讀，且面臨陸續出土文獻的挑戰，故需要在方法論上與知識考古學連接起來，作系統性的分析與整理，讓這些過去遭到正統史籍輕忽的文獻得以重見天日。換言之，張英進引用「知識考古學」這個概念，是要嘗試搜尋電影與城市文化的文獻來源，並進一步分析它們在民國時期的上海時空背景下，話語的形成方式和功能，以連結與文化史研究之間的關係。

近年來投入文化研究的學者中，李歐梵與張英進兩人有不少相似的地方。包括兩人都是華裔背景，而最近幾年關注的重點也都是放在中國電影及城市文化的研究上。其實，會出現這些雷同並非巧合。蓋因近年來上海取代了東京及香港的經濟地位，成為亞洲、甚至是整個世界矚目的城市，這波上海熱的蔓延，引發學術界的重視是必然現象。至於電影之引人注意，則與近年來文化研究的一個熱門課題有關，那就是大眾文化（Popular Culture，或譯為通俗文化）之研究。通俗文化研究的勃興，正是近十年抗戰文化史另一重要特色。

第三，抗戰時期大眾文化研究之勃興

近世以來，隨著媒體的快速發展，大眾文化成為二十世紀後期文化研究的重點所在，許多知名學者紛紛投入大眾文化相關領域的研究上。而國外第一本探討近代中國大眾文化的專書，是 1985 年由 David Johnson、Andrew Nathan（黎安友）、Evelyn Rawski 合編的《中華帝國晚期的大眾文化》[*Popular Culture*

雙月刊》，總期 37(1996)，頁 106-116〕。至於英文專著方面，最新的一本著作是《銀幕中國：當代華語電影的批判性介入、電影組構、跨國影像》[*Screening China: Critical Interventions, Cinematic Reconfigurations, and the Transnational Imaginary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Cinema*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2002)]。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爾後，即有許多相關論著紛紛出版。近年來針對抗戰時期中國大眾文化的論著，最著稱的莫過於洪長泰(Chang-Tai Hung)在 1994 年出版的專書：*War and Popular Culture: Resistance in Modern China, 1937-194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洪長泰的這本論著，主要是透過戲劇、漫畫、新聞報導來探討抗戰時期中國的大眾文化。洪氏指稱，經由上述傳播媒介可以發現，一種新形式的大眾文化在戰時中國蓬勃發展起來，而會有這種情形發生，跟毛澤東及其信徒的運作有極大關係。因爲他們相信，藉由這些淺白易懂的通俗藝術，可以將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及政治訴求讓廣大無知的群眾更清楚了解。易言之，抗戰時期中國大眾文化的興起，其實是政治權力操作下的結果。

在這本論著出版後，洪長泰以 1942 年 10 月 10 日在重慶中蘇文化協會舉辦的「第一屆雙十全國木刻展覽會」爲主軸，又發表了"Two Images of Socialism: Woodcuts in Chinese Communist Politic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 History* 39 (Jan 1997), Issue 1, pp. 34-60]一文，也直指中共在抗戰時期推動木刻運動，有其特殊的政治意圖與目的。另外，他還以類似觀點寫了〈歌曲的政治：中共戰爭音樂中的神話與象徵，1937-1949〉〔"The Politics of Songs: Myths and Symbols 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War Music, 1937-1949"，收入彭小妍編，《文藝理論與通俗文化》（台北：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9）〕。從上述論著的內容來看，洪長泰所指的大眾文化，其實就是毛澤東講的「大眾化」或「化大眾」的革命文化理論的實踐，其涉及到政治權力的運作問題。本來，在許多學者眼中，大眾文化一直是多種權力關係的一部份，總是在宰制與被宰制、權力以及對權力進行各種形式的抵抗之間游走。[31]況且無論是在戰時或平

31 大約自 1970 年代以後，有許多的理論家開始重新思索大眾文化的特性。而他們思考的重點，即擺在大眾文化與支配性權力結構者間的複雜關係，進而挖掘其政治內涵。這其中，尤以 John Fiske，《理解大眾文化》[*Understanding Popular Culture* (New York: Routledge, 1992)]一書最具代表性。

時，某些大眾化的藝術活動，如話劇、歌詠、漫畫、電影，極具宣傳效果，國家權力機器沒有不把操控的黑手不伸入的道理。台灣陳逢申的博士論文：〈戰爭與文宣：以中國抗日戰爭時期的話劇、音樂及漫畫為例(1937-1945)〉（台北：中國文化大學，2004）即圍繞著戰爭與文宣這兩個命題，分析話劇、音樂及漫畫的勃興及其宣傳強效，進而強調戰時政治力介入對文化轉型的影響。[32]由此可見，戰時大眾文化的興起，很明顯可以看出權力運作的痕跡。

事實上，不只探討通俗文化的專著是從權力結構角度切入，近年來許多學者在研究抗戰時期中國民間文化(folk culture)時，也是從此入手。[33]加州柏克萊大學博士 Felicity Anne Lufkin 的博士論文：〈現代中國的民間藝術，1930-1945〉("Folk Art in Modern China, 1930-1945")就聲稱，中國知識分子在 1930 年代初期剛碰觸這個概念時，其實是採納十九世紀西方民族學的觀點，把民間藝術視為現代文明和原始社會之間的連結物。是以總結來說，現代中國的知識分子對民間文化或藝術的觀感非常矛盾，因為他們一方面視民間藝術為民族精神和國家靈魂的展現，但另一方面又把它當作中國人迷信和落後的證據。此一讓中國知識分子愛恨相加的藝術形式，在抗日戰爭爆發後成為宣傳的最佳利器。只是此一新情勢的背後，還是政治干預下的結果。

將傅柯、葛蘭西(Antonio Gramsci, 1891-1937)等人理論大量注入傳播理論當中的美國學者 John Fiske，在他所著 *Understanding Popular Culture* (Boston: Unwin Hyman, 1989)一書曾指出，大眾文化必然包含了權力關係，受到主流——

32 對於抗戰時期的大眾文化，陳逢申還發表了〈抗戰中的漫畫・漫畫中的抗戰〉〔《近代中國》，期 143（2001 年 6 月），頁 47-79〕；〈豐子愷的抗戰漫畫：現代通俗文化的一個面向〉〔《國立台北師範學院學報》，期 14（2001 年 9 月），頁 399-437〕；〈撼動山河的抗戰大合唱〉〔《近代中國》，期 151（2002 年 10 月），頁 74-96〕等多篇文章。

33 民間文化一詞，常和大眾文化的定義被混在一起用。事實上，兩者之間是有不同的。在一般的定義裡，民俗藝術成長於社會下層，它是人民自發的、土生土長的表現，人們自己塑造它，不為高級文化的利益，只為他們自己的需要。大眾文化（注意與媒體密切相關）是從社會上層（文化工業、ISA）施加的，它由生意人僱用的技術專家所建構；它的閱聽人是被動的消費者，他們的參與僅限於買與不買的抉擇。民俗藝術則是人民自己的天地，是他們私人的小花園。上述內容見 Tony Bennett 著，蔡崇隆譯，〈媒體理論與社會理論〉，收入 Michael Gurevitch 等編，唐維敏等譯，《文化、社會與媒體：批判性觀點》（台北：遠流圖書出版公司，1994）。

國家或資本體制──文化的控制。縱觀近十年來研究戰時中國大眾文化的論著，均論及其背後確實有政治勢力運作的痕跡。其中，中共更是將此力量發揮到淋漓盡致的地步。國民黨在這場文化戰爭中，明顯地屈居下風。

第四，由邊緣到核心──淪陷區文化史研究的興盛

曾景忠在 1992 年主編的《中華民國史研究述略》（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曾指稱：「雖近年來『文化熱』方興未艾，但有關淪陷區文化的研究卻還在『熱圈』外徘徊。」[34]十年過去了，淪陷區顯然已由圈外走進了圈內，成為抗戰時期文化史研究的重要課題，許多知名學者均投入此一領域，並有重要成果發表，如前述李歐梵、張英進等人對於上海城市文化的研究，都可以劃入淪陷區文化史研究的範疇。至於傅葆石個人探討上海電影界，更是專門針對淪陷區文化史所作的研究。

其實近年來國外學者投入淪陷區文化史研究的人，還不只上述這些人。如加州大學博士 Mark S. Eykholt 的論文："Living the Limit of Occupation in Nanjingied, 1937-1946"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h. D. dissertation, 1998)即是。另外值得介紹的是，芝加哥大學博士 Shelley Stephens 的論文：〈被佔領的電影界：上海電影中的影星、影迷和國家民族，1937-1945〉("The Occupied Screen: Star, Fan, and Nation in Shanghai Cinema, 1937-1945,"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h. D. dissertation, 2000)，主題也是針對上海淪陷時期的電影界。她在這篇論文中，試圖藉由當時上海的文化圈、影評、影劇圈、電影院及電影劇情中所出現的物品等資料，來翻轉上述對淪陷區電影的偏頗印象，並重新審視這段紛亂時期的亞洲電影。另外，作者還嘗試從電影觀眾的角度來解釋上海淪陷時期的電影發展。Shelley Stephens 指稱，電影吸引觀眾的地方其實是電影明星，故上海淪陷時期的電影明星，仍然是鎂光燈的焦點。作者特別以當時兩位電影紅星──李香蘭和陳雲裳──為代表，來析探當時影迷眼中的女明星形

---

34 金光耀、張濟順，〈抗日戰爭時期淪陷區研究述評〉，收入曾景忠編，《中華民國史研究述略》（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頁 315-316。

象。其中，作者對於李香蘭這個 1940 年代上海電影圈傳奇性的神秘人物作了一番討論。她先是分析相關電影刊物怎麼報導這位在滿洲國出生、在中國受教育的日本影星是如何隱藏她的日籍身分，再以中國人面目出現的過程。作者緊接著指出，在上海電影雜誌中捧紅李香蘭的策略，與從無到有的「大東亞共榮圈」意識形態的推捧過程是很相似的。這是一個明星論述有助於泛亞洲政治的例子，所以李香蘭現象本身展現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一種文化侵略模式。另外，透過上海淪陷時期的電影劇情，作者發現它們所探討的內容，雖然大致不出政治與國家相關的議題，但是他們也注意到上海被佔據後，一些新的社會議題，如性別、階級和現代化問題，也都反映在此時期的電影中。故作者以為淪陷時期上海的電影工業，雖然是建立在一個虛幻的、遙不可及的想像世界，但是它卻多少反映了日軍佔領下的上海社會文化和政治輪廓。[35]

除了電影外，淪陷區的文學家及文學作品亦是重要課題。前面曾提及張泉、陳遼等人因張愛玲而起的論戰，多少反映這股研究熱潮。據統計，單是從 1994 到 1999 的幾年之間，大陸方面總論淪陷區文學的專書就有數本之多。[36]另外，加州大學博士 Nicole Huang 的專書《婦女・戰爭・家庭生活：四〇年代上海文學與流行文化》(*Women, War, Domesticity: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Popular Culture of the 1940s*)亦是以淪陷時期的上海女作家為主軸，探討日本佔領下的上海，女作家如何以一種全新的文學觀點來書寫這場戰爭及日軍佔領下的上海市。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從女性主義的角度發現，這些上海淪陷區的

---

35 事實上，近年來對於近代上海電影的研究，除了抗戰時期之外，戰前的上海電影及相關娛樂業也是學者注目的焦點。在這方面，最近出版的專書有胡平生，《抗戰前十年間的上海娛樂社會(1927-1937)：以影劇為中心的探索》(台北：學生書局，2002)，以及探討左翼電影的 Vivian Shen, *The Origins of Left-Wing Cinema in China, 1932-37* (New York: Routledge, 2005)；Laikwan Pang, *Building a New Cinema in China: The Chinese Left-Wing Cinema Movement*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2)等專書。

36 包括張泉，《淪陷時期北京文學八年》（北京：中國和平出版社，1994）；徐迺翔、黃萬華，《中國抗戰時期淪陷區文學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陳青生，《抗戰時期的上海文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孫中田，《鐐銬下的繆斯：東北淪陷區文學史綱》（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1999）；王向遠，《「筆部隊」和侵華戰爭——對日本侵華文學的研究與批判》（北京：北京師範大學，1999）等專書。

女作家不僅重新定義了生活和工作之間的界線，也爲當時的上海婦女——不管是家庭主婦或職業婦女——設計出每天生存的策略。易言之，日軍佔領下的上海女作家，不僅以激進手法挑戰文學的傳統，而且在文學寫作的過程中，尋求能顧及家庭生活的新方式。

淪陷區的教育概況，也是近年新興起的課題。像孔凡嶙，〈僞滿留日教育述論〉及王奇生，〈淪陷區僞政權下的留日教育〉（同見於《抗日戰爭研究》，1997 年第 2 期，頁 123-143、144-155）、汪朝光〈抗戰時期淪陷區的電影檢查〉（《抗日戰爭研究》，2002 年第 1 期，頁 144-155）、孫新興，〈日本在青島的殖民奴化教育評析〉及鐘春翔，〈抗戰時期的山東日僞教育〉（同見於《抗日戰爭研究》，2003 年第 1 期，頁 117-141、142-156）、周孜正，〈汪僞的留日學生教育〉及王士花，〈華北淪陷區教育概述〉（同見於《抗日戰爭研究》，2004 年第 3 期，頁 81-103、104-122）均是這方面的學術論著。楊家余的博士論文〈日僞統制下的東北教育研究：1931-1945〉（南京：南京大學博士論文，2002）亦以東北淪陷時期的教育爲題。美國方面，Mark Eykholt 的〈日本佔領下的南京學生生活〉("A Student Life in Nanjing under Japanese Occupa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ssociation of Asian Studies Annual Meeting. Honolulu, Hawaii, April 11-14, 1996)係探討淪陷時期南京各級學校的情況，特別是汪政權所設立的「僞中央大學」。而經過作者的研究發現，就連這個汪政權培養人才的高級學府裡，都有抗日的情緒和活動，讓汪政權頗爲尷尬。另外，從 1990 年代初期開始，即針對淪陷時期北京的教育概況及學校爲主題，陸續發表過一些文章的 Sophia Lee，她在密西根大學的博士論文：〈抗戰時期北京的教育，1937-1945〉("Education in wartime Beijing, 1937-1945")也指出日本人對佔領區教育的影響力，並沒有想像中來得大。雖說執政者曾嘗試透過教科書的修定，灌輸官方認可的意識形態，但事後證明這些措施根本無效。是以作者筆下淪陷時期的北京學校，實爲戰時北京社會與權力當局競逐的場域。

近年來引發學術界濃厚興趣的滿洲國，從中國本位的角度，也可以算是淪

陷區研究的一部份。[37]在這方面，大陸學者劉晶輝的《民族、性別與階層——僞滿時期的王道政治》（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2004）即試圖從滿洲國所高倡的「王道政治」，來審視滿洲國的婦女與青少年問題。Louise Young 的專著:《日本的「總體帝國」:滿洲國與戰時帝國主義的文化》[*Japan's Total Empire: Manchuria and the Culture of Wartime Imperialism*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亦對滿洲國的文化多所著墨，頗有參考價值。

從上述四點內容來看，近十年來的抗戰文化史研究有了很大變化。而這種變化的產生，多少跟「後學」的興起有關。蓋因後現代主義的一個特徵，就是對西方「主流話語」進行「解構」。換個簡單的說法，就是「抑強（勢）扶弱（勢）」，對於現有的價值觀念、知識體系，乃至於文化傳統及道德標準，全面地進行了無情的批判與否定。是以無論爲張愛玲及戰國策派翻案，或是淪陷區研究風潮的興起，在某種形式上正是對過去所形塑的正統論述進行解構工作。再加上諸如文本、知識考古學的概念一再被援引，我們不得不承認近十年來抗戰文化史的研究，實在是非常「後現代」。

肆、研究展望

無論是作品的數量抑或論述的內容，近十年來抗戰時期文化史的研究進步非常多。不過展望未來，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畢竟戰爭與文化的關係相當複

37 關於滿洲國，近年來頗受美國學界的注意。一個最明顯的例子，是從國家內捲化(state involution)理論探討民國時期國家權力與地方社會之關係而聞名的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杜贊奇(Prasenjit Duara)，前年也出版了《主權與真實：滿洲國與東亞的現代化》[*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 Manchukuo and the East Asian Modern* (Lanham Oxfor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3)]一書，以滿洲國爲案例，探討諸如帝國主義與民族主義、現代與傳統、統治與剝削等背反的二元性，如何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期間交互作用的問題。除此之外，Yoshihisa Tak Matsusaka, *The Making of Japanese Manchuria, 1904-1932*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1)；Louise Young, *Japan's Total Empire: Manchuria and the Culture of Wartime Imperial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Rana Mitter, *The Manchurian Myth: Nationalism, Resistance and Collaboration in Modern China* (Berkeley: Univeris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等，亦是以滿洲國爲研究主軸的專門性論著。

雜，可以探討的主題與方向非常多。[38]像近年來引發注意的「戰略文化」議題，就值得深入探討。

「戰略文化」(Strategic Culture)一詞，泛指一個國家在一定的歷史條件和文化傳統的基礎下，形成的戰略思維和戰略理論，這種戰略思想不僅指導軍事行動，且影響到社會文化與思想，因此至爲重要。[39]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戰時情報局(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請人類學家 Ruth Benedict 出馬，研究日本人的性格，基本上就是想從這個角度切入，進而了解日本人整個的戰爭文化觀。該研究成果在 1946 年出版，此即被譽爲近世研究日本人的經典名著——*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菊花與劍》）一書。[40]日本方面早有專書作探討，但反觀抗戰時期中國的戰略文化，似乎未見有深入討論。[41]到底當時中國的戰略文化爲何？黃河決堤、長沙大火是何種戰略思維下的舉措？國、共兩黨的戰略文化有何不同等等問題，都有探討的必要。

另外，受到許多國家政府頒訂「文化政策」、建立「文化機構」，甚至提倡不同的文化政策相抗衡之影響，近年來西方世界的文化研究開始轉移焦點到「文化政策」問題上。特別是官方制定「文化政策」背後的政治考量與意識形態，更引發注意。基本上，對國家的當權者而言，文化政策其實是一種象徵性的資本(symbolic capital)，可以用來做很多事。其中，「文化」最大的用處就是可以界定國家，甚至團結國家使之一致，是故許多政府積極制定文化政策，

---

38 國外專門針對戰爭與文化的書籍，其實不少。如 Richard A. Gabriel, *The Culture of War: Invention and Early Development*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90)一書，就運用了人類學、文學、考古學的方式，透過對人類早期戰爭的探討，論述戰爭與文化的關係。另外，美國伊利諾大學教授 John Lynn 的新著 *Battle: A History of Combat and Culture*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2003)亦用了嶄新的文化角度來探索從古至今各種戰爭中的文化問題。

39 其實，戰略文化一詞係 1970 年代始出現。當時第一本以戰略文化爲題出版的專書是 Jack L. Snyder, *Soviet Strategic Culture: Implication for limited Nuclear Operation*（《蘇聯的戰略文化：限核行爲的含義》）一書。見何奇松，〈戰爭文化研究概況〉，《軍事歷史文化》，2004 年第 1 期，頁 171-180。

40 可參看 Ruth Benedict 著，黃道琳譯，《菊花與劍》（台北：桂冠圖書出版公司，1974）。

41 事實上，隨著近年來中國的崛起，西方也開始注意到中國的戰略文化。Andrew Scobell 即著有 *China and Strategic Culture* (Carlisle Barracks, PA: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U.S. Army War College, 2002)一書。只是專門針對抗戰時期中國戰略文化的專書，似乎尚未出現。

希冀將一個民族或國家的文化，引導到某個特定方向。有時候各國更以擁有並維護「固有文化」自我期許，讓文化成為辨識各國或各族的標誌。換言之，「文化政策」跟「國家（民族）認同」大有關係。從此一角度來窺探中國政府在抗戰時期的某些作為，如兩次祭拜黃帝陵、高倡四維八德的精神，其用意甚為清楚，只是過去對於抗戰時期中國政府的文化政策，鮮少有論著出現。其實，諸如「抗日戰爭・國家塑造・文化政策」、「另一種對抗：戰時國、共兩黨文化政策之比較分析」、「抗戰時期國民黨的文化政策：以抗戰教本為中心的探討」此類課題，很值得研究。

除了「戰略文化」、「文化政策」之外，還有一些抗戰文化史議題也很有研究價值，前面曾提及的「戰爭與記憶」即是。另外，抗戰時期中國底層社會的狀況及一般庶民生活的形態，亦可再進一步討論，[42]畢竟文化的範疇非常廣泛，可以開發的議題甚多。是以放眼未來的抗戰文化史研究，仍有相當大的發展空間。

伍、結　語

受到「文化研究」、「文化史」蔚為顯學的影響，近十年抗戰文化史的研究，不僅範疇從文學、教育領域，跨越到過去較忽略的底層社會及庶民生活主題上，而且研究的觀點也從現代走向了後現代，許多與「後學」相關的論述紛紛被援引進來，讓研究內容豐富許多。雖說部份研究專著仍無法擺脫意識形態或愛國情緒的牽絆而有一些爭議，但是總體來說，近十年來抗戰時期的文化史研究，成績是相當卓著的。

42 對於戰時中國底層社會階級的研究，近年來的重點主要還是擺在工人身上。其中，Joshua H. Howard, *Workers at War: Labor in China's Arsenals, 1937-1953*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一書雖研究範圍至戰後，但主要的論述內容仍以抗戰時期為限，對於抗戰時期中國工人為生存奮鬥的實際情況有深入探討。

徵引書目

一、專書

Chris Jenks 原著，俞智敏等譯，《文化》。台北：巨流圖書公司，1998。
Ruth Benedict 著，黃道琳譯，《菊花與劍》。台北：桂冠圖書出版公司，1974。
文豐義，《血鑄的豐碑：中國抗戰文化》。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
水　晶，《張愛玲未完》。台北：大地出版社，1996。
水　晶，《張愛玲的小說藝術》。台北：大地出版社，2000。
王向遠，《「筆部隊」和侵華戰爭——對日本侵華文學的研究與批判》。北京：北京師範大學，1999。
王嘉良、葉志良、毛策，《中國東南抗戰文化史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
王德威：《如何現代，怎樣文學？19-20 世紀中文小說新論》。台北：麥田出版社，1998。
江　沛，《戰國策派思潮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
余　虹《革命・審美・解構——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理論的現代性與後現代性》。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
宋劍華主編，《現代性與中國文學》。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9。
李　怡，《七月派作家評傳》。重慶：重慶出版社，2000。
李雲漢，《六十年來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
李道新，《中國電影批評史：1897-2000》。北京：中國出版電影社，2002。
李歐梵口述，《徘徊在現代和後現代之間》。台北：正中書局，1996。
周燕芬，《執守反拔超越：七月派史論》。北京：中華書局，2003。
林幸謙，《歷史、女性與性別政治：重讀張愛玲》。台北：麥田出版社，2000。
金延鋒、黃旦主编，《浙江抗戰文化》。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5。
金重遠，《炮火中的文化》。台北：淑馨出版社，1990。
芮逸夫主編，《雲五社會科學大辭典》，冊 10。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9。
俞兆平，《現代性與五四文學思潮》。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2。
胡平生，《抗戰前十年間的上海娛樂社會(1927-1937)：以影劇為中心的探索》。台北：學生書局，2002。
胡國台，《浴火重生：抗戰時期的高等教育》。台北：稻香出版社，2004。
孫中田，《鐐銬下的繆斯：東北淪陷區文學史綱》。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1999。
徐迺翔、黃萬華，《中國抗戰時期淪陷區文學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
高全之，《張愛玲學：批評・考證・鉤沉》。台北：一方出版社，2003。
張　谷，《華麗與蒼涼：張愛玲紀念文集》。台北：皇冠出版社，1996。
張　泉，《淪陷時期北京文學八年》。北京：中國和平出版社，1994。

張　泉，《抗戰時期的華北文學》。貴陽：貴州教育出版社，2005。
張　紅，《抗戰中內遷西南的知識分子》。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
陳青生，《抗戰時期的上海文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陳曉明主編，《現代性與中國當代文學轉型》。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3。
馮崇義，《國魂，在國難中掙扎──抗戰時期的中國文化》。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
馮啓宏，《戰國策派之研究》。高雄：復文書局，2000。
黃金麟，《歷史、身體、國家：近代中國的身體研究》。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2。
黃金麟，《政體與身體：蘇維埃的革命與身體》。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5。
楊澤主編，《閱讀張愛玲──張愛玲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台北：麥田出版社，1999。
溫奉橋，《現代性與 20 世紀中國文學》。北京：中國海洋大學，2004。
葉德浴，《七月派：新文學的驕傲》。北京：中國文聯，2001。
劉大年、白介夫編，《中國復興樞紐──抗日戰爭的八年》。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黎維新，《長沙文化城：抗戰初期長沙抗日救亡文化運動實錄》。長沙：湖南出版社，1995。
盧正珩，《張愛玲小說的時代感》。台北：麥田出版社，1994。
蕭效欽、鍾興錦編，《抗日戰爭文化史》。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2。
薛新力主編，《重慶文化史》。重慶：重慶出版社，2001。
魏可風，《張愛玲的廣告世界》。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02。
蘇文光，《抗戰時期重慶的文化》。重慶：重慶出版社，1995。
蘇偉貞，《孤島張愛玲：追蹤張愛玲香港時期(1952-1955)小說》。台北：三民書局，2002。

Duara, Prasenjit. *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 Manchukuo and the East Asian Modern.* Lanham, Oxfor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3.

Fiske, John. *Understanding Popular Culture.*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Fu, Poshek. *Passivity. Resistance, and Collaboration: Intellectual Choices in Occupied Shanghai, 1937-194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Fu, Poshek. *Between Shanghai and Hong Kong: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Cinema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Gabriel, Richard *A. The Culture of War: Invention and Early Development.*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90.

Howard, Joshua H. *Workers at War: Labor in China's Arsenals, 1937-1953.*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Huang, Nicole. *Women, War, Domesticity: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Popular Culture of the 1940s.* Boston: Brill, 2005.

Hung, Chang-Tai. *War and Popular Culture: Resistance in Modern China, 1937-194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Israel, John. *Lianda: A Chinese University in War and Revolutio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Lee, Leo Ou-Fan. *Shanghai Modern: The Flowering of a New Urban Culture in China, 1930-1945.*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Lynn, John. *Battle: A History of Combat and Culture.*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2003.

Matsusaka, Tak Yoshihisa. *The Making of Japanese Manchuria, 1904-1932.*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1.

Mitter, Rana. *The Manchurian Myth: Nationalism, Resistance and Collaboration in Modern China.* Berkeley: Univeris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Pang, Laikwan. *Building a New Cinema in China: The Chinese Left-Wing Cinema Movement.*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2.

Scobell, Andrew. *China and Strategic Culture.* Carlisle Barracks, PA: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U.S. Army War College, 2002.

Shen, Vivian. *The Origins of Left-Wing Cinema in China, 1932-37.*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Shu, Yunzhong Shu. *Buglers on the Home Front: The Wartime Practice of the Qiyue School.*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0.

Williams, Raymond. *Keywords.* London: Fontana, 1976.

Young, Louise. *Japan's Total Empire: Manchuria and the Culture of Wartime Imperial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Yu, Xue. *Buddhism, War, and Nationalism: Chinese Monks in the Struggl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1931-1945.*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Zhang, Yin-gjin. *The City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 Film : Configurations of Space, Time, and Gender.*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Zhang, Yin-gjin. *Screening China: Critical Interventions, Cinematic Reconfigurations, and the Transnational Imaginary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Cinema.*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2002.

二、論文

Tony Bennett 著，蔡崇隆譯，〈媒體理論與社會理論〉，收入 Michael Gurevitch 等編，唐維敏等譯，《文化、社會與媒體：批判性觀點》。台北：遠流圖書出版公司，1994。

孔凡嶙，〈偽滿留日教育述論〉，《抗日戰爭研究》，1997 年第 2 期，頁 123-143。

王士花，〈華北淪陷區教育概述〉，《抗日戰爭研究》，2004 年第 3 期，頁 104-122。

王奇生，〈淪陷區偽政權下的留日教育〉，《抗日戰爭研究》，1997 年第 2 期，頁 144-155。

石世明等，〈民族解放意識與文學現代化的雙向突進——對抗戰時期的重慶文學現象的思考〉，《重慶工商大學學報》，2004 年第 4 期，頁 140-143。

朱崇科，〈評李歐梵《上海摩登：一種都市文化在中國一九三〇——一九四五》〉，《當代》，期

184，2002年12月，頁128-141。
何奇松，〈戰爭文化研究概況〉，《軍事歷史文化》，2004年第1期，頁171-180。
汪朝光，〈中國影評中的美國電影〉，收入陶文釗、梁碧瑩主編，《美國與近現代中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
汪朝光，〈三十年代初期的國民黨電影檢查制度〉，《電影藝術》，1997年第3期，頁60-66。
汪朝光，〈民國年間美國電影在華市場研究〉，《電影藝術》，1998年第1期，頁57-65。
汪朝光，〈戰後上海美國電影市場研究〉，《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1期，頁119-140。
汪朝光，〈抗戰時期淪陷區的電影檢查〉，《抗日戰爭研究》，2002年第1期，頁26-51。
周孜正，〈汪僞的留日學生教育〉，《抗日戰爭研究》，2004年第3期，頁81-103。
周燕芬，〈從流派的構成看七月派的存在形式與特徵〉，《華中師範大學學報》，2002年第2期，頁125-128。
周燕芬，〈文學流派與經典營構——以「七月派」爲例〉，《人文雜誌》，2004年第4期，頁40-44。
金光耀、張濟順，〈抗日戰爭時期淪陷區研究述評〉，收入曾景忠編，《中華民國史研究述略》。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
孫新興，〈日本在青島的殖民奴化教育評析〉，《抗日戰爭研究》，2003年第1期，頁117-141。
袁桂娥，〈抗戰時期豐村小說創作的獨特思考〉，《平頂山師專學報》，2000年第1期，頁22-23。
袁桂娥，〈爲戰時的北方農民塑像——豐村小說人物談之一〉，《平頂山師專學報》，2003年第3期，頁41-42。
馬　勇，〈50年來的抗戰時期思想文化研究〉，《抗日戰爭研究》，1999年第3期，頁178-203。
張　泉，〈中國淪陷區文學的研究中的政治立場問題——「對《淪陷時期北京文學八年》一書的政治評價」的回應〉，《北京社會科學》，1997年第4期，頁98-105。
張　泉，〈史實是評說淪陷區文學的唯一前提——對「淪陷區文學評價問題」的回應〉，《文藝報》，2000年3月28日。
張　泉，〈二論史實是評說淪陷區文學的唯一前提——對「淪陷區文學認識誤區」的回應〉，《北京社會科學》，2001年第2期，頁132-139。
張　泉，〈淪陷區文學研究應當堅持歷史的原則——談淪陷區文學評價中的史實準確與政治正確問題〉，《抗日戰爭研究》，2002年第1期，頁1-23。
張英進，〈審視中國：評五本中國電影研究的英文書籍〉，《二十一世紀雙月刊》，總期37，1996，頁106-116。
張英進，〈中國電影中的民族性與國家話語〉，《二十一世紀雙月刊》，總期44，1997年12月，頁74-84。
張英進，〈娼妓文化、都市想像與中國電影〉，《當代》，期137，1999年1月，頁30-43。
張英進，〈民國時期的上海電影與文化〉，《二十一世紀雙月刊》，總期60，2000年8月，頁98-106。
張英進，〈美國電影中華人形象的演變〉，《二十一世紀》，2004年6月號，頁85-94。
張連紅，〈南京大屠殺對南京市民社會心理的影響〉，《江蘇社會科學》，2000年第6期，頁112-116。

張連紅，〈南京大屠殺之前南京市民的社會心理〉，《抗日戰爭研究》，2002 年第 4 期，頁 83-104。
張連紅，〈南京大屠殺與南京市民的創傷記憶〉，《江海學刊》，2003 年第 1 期，頁 146-151。
張瑞德，〈抗戰時期大後方工商業者的心態與行動〉，《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期 27，1999 年 6 月，頁 121-146。
張瑞德，〈戰爭與工人文化──抗戰時期大後方工人的認同問題〉，收入黃克武主編，《中央研究院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軍事組織與戰爭》。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
陳　遼，〈「張愛玲熱」要降溫〉，《文藝報》，1996 年 5 月 3 日。
陳　遼，〈關於淪陷區文學評價中的幾個問題〉，《文藝報》，2000 年 1 月 11 日。
陳　遼，〈淪陷區文學評價中的三大分歧──對「關於淪陷區作家的評價問題──張愛玲個案分析」的回應〉，《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01 年第 3 期，頁 119-125。
陳　遼，〈也談淪陷區文學研究中「歷史的原則」──與張泉先生商榷〉，《抗日戰爭研究》，2003 年第 1 期，頁 157-172。
陳逢申，〈抗戰中的漫畫・漫畫中的抗戰〉，《近代中國》，期 143，2001 年 6 月，頁 47-79。
陳逢申，〈豐子愷的抗戰漫畫：現代通俗文化的一個面向〉，《國立台北師範學院學報》，期 14，2001 年 9 月，頁 399-437。
陳逢申，〈撼動山河的抗戰大合唱〉，《近代中國》，期 151，2002 年 10 月，頁 74-96。
傅葆石，〈淪陷時期上海電影的娛樂政治〉，收入紀念七七抗戰六十週年學術研討會籌備委員會編，《紀念七七抗戰六十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國史館，1998。
黃曼君，〈現代・反思・延異──胡風與七月派現代性重讀〉，《華中師範大學學報》，2003 年第 5 期，頁 86-95。
楊洪承，〈七月派文學群體的文化結構探源──現代中國文學社群的個案研究之一〉，《社會科學輯刊》，1998 年第 6 期，頁 144-150。
溫奉橋，〈「現代性」規範的調整──張恨水「抗戰小說」新論〉，《中國海洋大學學報》，2003 年第 6 期，頁 46-50。
蔣永敬等，〈「抗戰史研究座談會」紀錄〉，《近代中國》，期 107、108，1995 年 6、8 月，頁 15-35、213-233。
魏朝勇，〈疏離與敞開──由兩個小說〈寒夜〉、〈傾城之戀〉文本談抗戰時期文學現代性的另向維度〉，《純文學》，復刊期 6，1998 年 10 月，頁 20-28。
羅久蓉，〈抗戰勝利後中共懲審漢奸初探〉，《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23（下），1994 年 6 月，頁 267-292。
羅久蓉，〈歷史情境與抗戰時期「漢奸」的形成：以一九四一年鄭州維持會為主要案例的探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24，1995 年 6 月，頁 815-842。
羅久蓉，〈張愛玲與她成名的年代(1943-1945)〉，收入楊澤主編，《閱讀張愛玲研討會論文集》。台北：麥田出版公司，1999。
羅久蓉，〈軍統特工組織與戰後漢奸審判〉，收入一九四九年中國的關鍵年代學術討論會編輯委員

會編，《一九四九年：中國的關鍵年代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台北：國史館，2000。
羅久蓉，〈戰爭與婦女：從李青萍漢奸案看抗戰前後的兩性關係〉，收入呂芳上主編，《無聲之聲：近代中國與國家(1600-1950)》。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
Fu, Poshek. "Struggle to Entertain: The Ideological Ambivalence of the Wartime Shanghai Film Industry, 1942-1945." Paper delivered at the 108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January 8, 1994.
Fu, Poshek. "Framing History: Popular Film Culture in Wartime Shanghai."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ssociation of Asian Studies Annual Meeting. Hilton, Washington, April 6-9, 1995.
Fu, Poshek. "The Ambiguity of Entertainment: Chinese Cinema in Japanese Occupied Shanghai, 1941-1945." *Cinema Journal* 37:1, 1997, pp. 66-84.
Fu, Poshek. "Projecting Ambivalence: Chinese Cinema in Semi-occupied Shanghai, 1937-1941." In W. Yeh, ed., *Wartime Shanghai*.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Fu, Poshek. "Telling A Woman's Story: Eileen Changand The Invention of Woman's Film in Postwar China." In Law Kar, ed., *Transcending the Times: King Hu and Eileen Chang*. Hong Kong: Urban Council, 1998.
Lo, Jiu-jung. "Survival as Justification for Collaboration, 1937-1945." In David P. Barrett and Larry N. Shyu, eds., *Chinese Collaboration with Japan, 1932-1945: The Limits of Accommod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Lo, Jiu-jung. "Trials of Taiwanese as Hanjians/War Criminals and Post-war Search for Taiwan Identity." In Kai-sing Chow, Kevin M. Doak, and Poshek Fu, eds., *Imagining National Identity in Modern East Asia*.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1.

三、博碩士論文

丁曉萍，〈『戰國策派』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反思〉。北京：北京大學碩士論文，1994。
王同起，〈抗日戰爭時期的文化思潮〉。天津：南開大學博士論文，2000。
林君儀，〈抗戰後期的學者散文──王力、梁實秋、錢鍾書三家研究〉。新竹：國立清華大學碩士論文，1995。
林志宏，〈戰時中國學界的「文化保守」思潮(1941-1948)──以《思想與時代》為中心〉。中壢：國立中央大學碩士論文，1997。
袁桂娥，〈抗戰語境下的豐村小說研究〉。重慶：西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3。
陳逢申，〈戰爭與文宣：以中國抗日戰爭時期的話劇、音樂及漫畫為例(1937-1945)〉。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博士論文，2004。
彭永貞，〈冼星海與抗戰時期的歌詠運動〉。台北：台灣師範大學碩士論文，1996。
黃蘭燕，〈豐子愷文人抒情漫畫研究──以 1937 年畫作之研究〉。中壢：國立中央大學碩士論文，2002。

溫楨文，〈抗戰時期商務印書館之研究〉。新竹：國立清華大學碩士論文，2002。
劉惠璇，〈抗戰時期大後方大學訓育問題之研究〉。台北：台灣師範大學博士論文，1997。
蔡岳璋，〈陝甘寧邊區的農村教育(1937-1947)〉。台北：國立政治大學碩士論文，2003。
鄭炯兒，〈從掃蕩到和平——掃蕩報之研究(1931-1950)〉。台北：台灣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0。
魏小奮，〈戰國策派：抗戰語境裡的文化反思〉。北京：北京大學博士論文，2002。
Liang, Kan.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the War: Chongqing, 1937-1945." Yale University Ph. D. dissertation, 1995.
Stephens, Shelley. "The Occupied Screen: Star, Fan, and Nation in Shanghai Cinema, 1937-1945."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h. D. dissertation, 2000.

War and Culture: Looking Back at the Last Decade of Historical Studies of the Culture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Period

Feng Chi-hung*

Abstract

Since the 1970s and 1980s, historical research on culture and cultural studies has been reinvigorated, and many topics have become the focus of scholarly research. "War and culture" was one such research topic. Reflecting this scholarly trend, in the last few years many scholars have delved into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period. This article looks back at the last decade of research by American, Chinese, and Taiwanese scholars on Chinese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period, in order to provide a general reference source for the academic community.

Keywords: Anti-Japanese War, history of war, popular culture

* The Center of General Education, Tajen University